

第一章

价值存在 价值理论的本体论承诺

价值作为一种哲学话语体系，应当是由其存在论的发问方式开始的。当我们询问：“价值是什么？”的时候，便必然地要求我们对于价值的存在基础、价值的存在条件、价值的存在方式等问题做出深入的思考。否则，价值便成为无本之木、无基之塔，从而无法得到对于价值本质的最终认识，也就更谈不上对其后的价值分类、价值评价、价值运用、价值创造、价值实践、价值实现等问题的正确认识了。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对价值的本体论意义的发掘和探索，在一个科学、合理的本体论承诺基础上，开展价值问题的言说，才能够消除用日常生活的价值话语取代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话语的倾向，才能够构建起正确引导人的行为和实践的价值理论大厦。

第一节 本体论与价值论

在当代诸多的领域性哲学中，价值论作为人类用于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及其人类自身的一种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理论视野和解释原则，是与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相并列的另一个哲学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价值论与本体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断裂，事实上，人生存于现实、生动的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之中，在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中生存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先在规定

性。要反思、批判和构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体系，其基本前提是要透过人类、社会、世界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现实状况洞察和把握其本来状况。只有通过寻根究底的追问方式或思维方式把握了这种本来状况，才能进而构想其可能状况和确立其理想状况，从而构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体系。可见，价值论与本体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批判性的关联，科学地揭示这种关联性，是价值理论生存和发展的逻辑前提。

一 本体论向价值论的转向

进入 20 世纪以来，一个显而易见的理论现象是：当代哲学主题正在从确立在抽象的理念世界以及客体世界之上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形态转向根植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价值论形态。

导致这种哲学主题转向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既有人类哲学思维自身逻辑发展的因素，同时还包含着哲学形态之外的外部推动力。概言之，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从本质上说是对整个现实世界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最高层次的反思。哲学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所探究的基本问题只能是对整个世界最为基本的矛盾的反映和反思。因而，随着人类在现实世界中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变化，哲学所探究和解答的基本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不同内容和形态的转换。

尽管“本体论”这个概念的出现，是 18 世纪以后的事情，但是，近代以前，在传统理性主义精神规导下的所有哲学思维形态，都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本体论”哲学。从西方哲学史来看，本体论作为一门学问起源于对万物本原也就是本体问题的追问。所谓“本原”（英文的对应词是 Principle，亦译为“始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就是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由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其属性变化不已，而其本体常居不

变的那个东西。这种认识形式的特点使其提出的问题必然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在古代哲学中，世界起源论和世界本质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后者显然从属于前者，世界的本质、万事万物的本质都被归结为它们最终极的始基或造物主，一切都是由始基或造物主所决定和主宰的。这样，世界的本原、本体，就通过从抽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或被归结为构成万物始基的初始物质，或被归结为理念，或被归结为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于是古代哲学就分成了朴素唯物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

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前后，伴随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的实践能力、尤其是工业实践的兴起和发展，哲学发生了面向自然科学、面向人的转向。西方哲学走出中世纪跨入近代所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是挣脱神学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针对中世纪神学一切为了神的宗旨，人文主义者宣称：“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因此，自文艺复兴开始，对外部世界的诘问转变成对人的自我反思，哲学本体论的重心开始向主体转移，传统的世界起源论开始受到不断的冲击和挑战，而颂扬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风尚。在近代哲学家看来，哲学最终当然要讨论存在本身。然而，世界呈现为千姿百态的具体事物，而人的认识却是一般的概念与结论，这种不一致的症结何在？显然，如果将世界本原问题扩展开来，其实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亦即主体如何认识把握客体的问题。这种思潮以笛卡尔为开端，他通过“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首次发出了将自我意识原则明确引入本体论的宣言，使传统的本体论逐渐向近代认识论方向转向。这种转向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不同范式的争论中展开的。理性主义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感觉只能提供现象和片面的认识，认识不了本体。强调只有依靠理性才能获得对

事物的普遍的、必然的认识，才能认识本体；经验主义则把眼光固守于经验知识领域，对本体论持否定态度。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命题中，存在物之存在是以感觉经验来确证的，对于不能从感觉经验中得到确证的范畴便统统予以清除。19世纪的康德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各自的弊病和片面性，他深刻地指出，单靠感性经验或理性的独断都不能获得普遍的、必然的认识，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他在追问认识何以可能时，提出了感觉和先验认识形式或感性和知性相结合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这是将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以解决本体问题的一个尝试。然而，康德通过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却得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对人显现的现象界，而达不到对人心之外的物自体认识的结论，即人们只能获得事物的现象的经验性认识，对于“物自体”本身，他虽然承认它是存在着的，但却认为它是不可认识的。它属于“智性直观”的“信仰”领域。如果用知性形式去认识那些关于灵魂、自由、上帝、本质等超验的理念，则必然陷入自相矛盾，出现“二律背反”。康德的思想虽有许多深刻之处，但他对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此岸”与“彼岸”的设定，不仅没有解决主客体的对立，反而使其在本体论上得到了强化，使认识论和本体论、思维和存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陷入了尖锐的对立之中。因此，自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家便开始了把认识论与本体论、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的探索。费希特用“自我创造非我”的主观理性主义来说明“自我”与“非我”是统一的，而谢林和黑格尔则用“客观精神”来统一分离的主客体。尤其是黑格尔，他把人的理性加以绝对化、实体化改装成了创造一切的“绝对精神”，在他看来，当绝对精神通过它的辩证发展，创造或异化出自然界和人类精神并返回自身时，它也就达到了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黑格尔以绝对理念自

身的逻辑发展规律为基础的思维与存在、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实现了与认识论、逻辑学融为一体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使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实体还原模式哲学本体论达到了峰巅。然而，这种以绝对精神为本的统一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独断的统一，尽管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毕竟由于其本体论的虚妄和独断而受到后来的哲学家的激烈批判。

自康德哲学之后，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走向是迈向意义世界。意义问题的突出在于：“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了。形而上学的欲望和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就是，一方面生活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做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①在对这些对立、矛盾与分裂的解答中，西方哲学出现两大新的走向——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

科学主义的哲学流派以尊重和相信科学为特征，把科学当作哲学的依据，把科学方法（例如实验方法、分析方法、系统方法等）当作哲学方法的重要事实根据，认为哲学为各专门科学的方法提供理论根据。它们有的由此把哲学当作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他们同样谈论人的问题，大部分流派还企图超越形而上学以及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分立，从而也超越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科学主义哲学的大多数流派都是从不可证明、不可检验的角度来反对传统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的，他们一般都不研究本体论、认识原则问题，着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发展的规律性进行研究，他们崇拜实证哲学，主张用精确科学的模型来改造哲学，从而增加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

^①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5 页。

性，建立新的科学哲学。科学主义在批判古典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同时，继承了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理性主义传统，其中的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试图以“经验——逻辑”的框架取代经典的归纳主义，去解决理性主义的内在矛盾。他们主张把科学论断在经验方面有无意义以及科学发现的方法论这两个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主张把实证主义的经验原则与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并且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与证实必须依靠经验，即使不能被事实证明为绝对的真，也可以被证明为有一定概率的真，还强调科学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科学是按一定方法取得的，所以把事实和逻辑作为科学与非科学化界的标准，作为评价检验理论和假设的工具。主张凡是得不到经验观察支持的概念原理一律属于思辨的形而上学，都必须加以抛弃。

人本主义的哲学流派则强调人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将哲学视角直接指向人的生存意义的问题。他们反对把人归结为科学理性的存在，要求揭示人的生命、本能、情感、意志等非理性或超理性存在的意义；有的甚至认为，只有后者才是人的本真的、始源性的存在、并应当成为哲学的核心。人本主义者立足于人的主体来谈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人与世界的主客关系不只是感知和被感知、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给予和被给予的意义关系，主张物的意义、世界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不是来自于人的主体之外的任何存在，而是来自于人及人的主体活动。这表明人所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与人及人自己的活动无关的世界，而是一个与人及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世界；这表明以寻求真知为出发点的知识论哲学已被以寻求意义为出发点的价值哲学所取代。

20 世纪此起彼伏的哲学流派经过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碰撞及合流变通后，便以自觉不自觉的方式发生着一个普遍的哲学

转向，即对人类价值理想的内在生活眷顾。由此导致现代价值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多样化演进。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和理性主义倾向及其衰落和终结，为现代价值理论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并提供了契机。用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文德尔班的话来说，哲学已到了莎士比亚悲剧里所写的古代不列颠李尔王的地步，他把自己的王国和财产全部分给他的三个女儿，只给自己留下一个乞丐的讨饭袋，最后在风雨之夜被长女和次女逼到荒郊，在悲痛疯癫中死去。原来无所不包的哲学现在一无所有，现实领域没有一个是专门属于哲学的。为了给人和社会的发展指示方向，哲学必须重新寻求出路，它“只有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科学才有生命力。哲学以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些价值作为自己的领域。”^①即哲学必须放弃一切不切合实际的形而上学的要求，从价值出发，对一切价值做出重新评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那些在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解决那些在人类思维和认识中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基于此，文德尔班在休谟、康德和洛采哲学的基础上，把价值概念引进哲学并使之提升为哲学的中心概念。其后的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与他的两个学生迈农和艾伦菲尔斯，不仅在前人开辟的价值研究方向和道路上继续开拓，而且试图并努力建立一种更系统、更普遍、更有效的能统摄一切价值的一般价值理论。从此以后，价值哲学不仅作为哲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建立起来，而且其影响迅速扩大，其发展势不可挡，以至于成为整个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之一。反映在价值哲学理论研究上，便是价值论研究出现了元理论盛行、学派林立的理论批判和分化状况，诸如，关于价值本质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1926年英文版，第611页。转引自江畅：《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关于价值意识和评价的认识主义和非认识主义的对立，关于价值认识方式的自然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对立，关于价值研究方式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关于价值与科学、真理之间一元统一的观点和多元化主张的对立等等。这些不同的主张相互交叉渗透，以至于当时的各种哲学流派几乎都这样或那样地介入了有关的争论。20 世纪中叶以来，价值论研究又进一步呈现出现实化和综合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从理论的争论走向较重视现代人类社会带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如科学技术、生态环境、人口和生命、战争与和平、文化文明与社会发展等全球性价值问题。^① 在 20 世纪，西方哲学流派繁多，如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价值哲学、现象学价值哲学、新实在主义价值哲学、实用主义价值哲学、逻辑实证主义价值哲学、人格主义价值哲学、存在主义价值哲学等等，尽管各学派对价值的理解不同，但都重视价值问题研究，从不同角度研究价值问题，内容丰富多彩。我们可以说，20 世纪既是价值哲学逐步产生、形成和繁荣的世纪，也是价值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世纪。

价值哲学之所以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最重要的原因是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对事实（狭义的事实）问题的研究，而缺乏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即哲学作为世界观，只有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缺乏价值论）。价值哲学的兴起，克服了这种片面性，反映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我国的价值哲学研究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时涉及价值问题，进而追问价值认识与事实认识、真理与价值是什么关系开始，很快涉及价值的本质、价值的客观性、价值的主体性、价

参见李德顺主编：《价值学大词典》，“价值学”词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值的分类结构、价值的观念的本质与结构、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和一元性、价值与评价的关系、价值尺度与评价标准、价值判断与评价逻辑、人的价值、人生价值观的选择与人权问题、个人价值与人类价值、中国传统价值论思想、西方价值论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价值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与认识论的关系、价值哲学在整个哲学中的地位等等。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的观点在争论。譬如我国理论界对价值范畴的界定，主流上倾向于以“实践思维方式”为前提，在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把握价值本质。而就价值范畴的具体分析而言，则存在着理性化和非理性化的研究方式以及“事实”和“价值”二分与统一的研究模式，存在着用“意义”、“有用性”、“合目的性”、“效用性”、“人”等界定价值，存在着“理念说”、“实体说”、“属性说”、“关系说”等等的分歧。此外，关于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同样莫衷一是。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批判的哲学，价值批判从属于历史性的批判；另一种则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批判与建设的哲学，实践的批判性与建设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立足点是马克思的实践观。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哲学理论界在价值理论研究方面的活跃程度，另一方面又说明价值理论研究的“瓶颈”问题尚未解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价值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价值论伴随着当代人类问题的突出而成为哲学中的“显学”，无疑是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然而，在 20 世纪价值哲学表面繁荣的背后，同样也隐藏着自身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在现代西方价值哲学中既表现为各种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如主观主义价值论和客观主义价值论的矛盾、自然主义价值论与直觉主义价值论的矛盾、认识主义价值论和非认识主义价值论的矛盾、存在价值论与评价价值论的矛盾、一元价值论与多元

价值论的矛盾、元价值理论与规范价值理论的矛盾等等；还表现为对于人类现实价值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如功利、道德、美感、幸福、真知、信仰、自由等的不同认识。从深层意义上说，它体现着人们在价值问题研究上的客观化立场和主观化立场、人文化思维和科学化思维、人的观点和自然观点、元问题探究视角和规范观念建构维度等各种思维方法的相互对立。从整个价值哲学研究的状况看，一是价值哲学越来越分化成为相互对立的不同流派，各派价值理论及其观念之间的矛盾分歧难以化解、争论不休，使得整个价值哲学研究看起来是零散的、混乱的，既无中心，也无边际。使得整个价值哲学的发展陷入困境、止步不前，也使得人类价值追求难以选择、无所适从。二是许多哲学家不重视甚至拒斥本体论的研究，本体问题（特别是宇宙本体）被认为是非理性所能解决的而被加以拒斥或加以悬置，不再受到重视。即便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将本体论与价值论相互对立，认为价值论是对本体论的超越的理论倾向。本体论淡化，的确进一步突现了价值论，但是，价值论没有本体论作为基础，没有认识论提供支持，也许就再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哲学了。

二 价值论向本体论的寻求

当代价值理论是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随之带来一个问题：价值理论的研究是否因此便可以告别本体论，本体论与价值论之间是否存在着一道划界式的鸿沟？

纵观现代价值哲学的发展历程，受近代西方认识论致思方式的影响，早期价值理论的研究就其泛泛以求某种绝对永恒的原则而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认识论式”价值论。原因就在于这种

研究与近代知识论哲学颇为相似，它企图像认识论那样去寻求知识的基础性原则而达到真理，进而寻求和确定“至善”的最高价值原则。不论是休谟还是康德，在他们似乎是千差万别的原则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和从事这些研究的哲学家们抱着一个共同信念：“善”或“至善”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或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并确定这种“善”或“至善”，并由此而获得普遍有效的结果。显然，“善”或“至善”若被看做是价值领域的终极真理，哲学家们的主要精力便也集中在提供各种自认为是最好的价值原则上。这种研究思路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各种价值原则的相互比较及争斗，目的是获得和达到最高的永恒原则。遗憾的是，这种放弃了对最终价值本体的寻求，把价值研究当作追求和获得永恒真理的做法造成的结果，却是在情感主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泛滥中无可奈何地忍受着价值判断合理性危机带来的种种荒唐和混乱，甚至最终造成了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性的异化倾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所说的“利益最大化的元叙事”。最先提出“经济人”假说的亚当·斯密，曾经毫不讳言地认为，作为“经济人”的资本家把追求自身私利看做从事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是天经地义的，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是其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伦理观（价值观）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赚钱，以及由此体现的人生目的——获利，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竟被赚钱的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①而

马 克 斯 · 韦 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37 页。

马克思则是用更为生动的语言讥讽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利益最大化原则驱使下导致的人性扭曲和异化现象：“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护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①

当然，将当代西方社会人性的异化及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泛滥统统归结为西方价值理论的本体论缺失，似乎有失全面。然而，价值理论所承担的使命是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提供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基础，价值哲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确立作为一切价值之最终基础和依据的本体价值，建立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理想和人们心悦诚服地自觉遵从的价值原则和评价事物及人的行为之善恶的价值准则。而若一种价值哲学没有明确的价值本体论承诺，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一切价值之基础和依据的寻求与确立，从而也就放弃了对价值判断合理性准则的认定和确立，从而会使一个社会陷入价值混乱，失去价值标准。也就是说，价值哲学本质上解决的是人类的信仰基础问题，就这一点而言，价值论便与本体论密不可分。因为，（1）本体论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能给人们提供各种不同的最高哲学信念或哲学信仰。虽然表面上看来，哲学本体论体现为一种逻辑范畴的理论体系，但实际上它深深的扎根于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之中。文德尔班说：“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科学必须满足两种需要。人们期待它提供包罗广泛，基础坚定和尽可能完备的有关一切知识的原理，以及持此原理所获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99 页。

的信仰，这种信仰将为人类生活提供内在的支持。”^① 哲学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可供人们选择的两种终极性的信仰。在哲学信仰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必定到宗教中去寻求终极性的价值信仰。与此同时，一些不愿以宗教作为自己的终极性价值信仰的人，他们或者信奉感性主义，或者成了无信仰的人，无所顾忌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类信仰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这是十分危险的，人类很可能因为信仰混乱而陷入苦难之中。（2）本体论的另一重要功能是批判现实，它通过探寻本真世界并以这一世界为尺度衡量和批判现实的世界，使现实世界趋向本真世界，防止现实变质和异化。消解和拒斥了本体论之后，也就没有了对本真世界的探求，没有了基于本真世界的对可能世界的选择和对理想世界的构建，因而也就失去了衡量现实世界的尺度和批判现实世界的武器。（3）本体论的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引导人们适度地超越现实的、世俗的生活，适度地“出世”，不仅关注世俗的功名利禄，而且也关注终极的精神完善。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可以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追求物质需要的不断满足，二是追求精神需要的不断满足。追求适度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度；一旦过度，就可能产生很多问题，如缺乏新的满足而感到精神空虚的问题、不能满足感到痛苦的问题、为了满足贪欲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问题、整个人类过分追求物质满足导致自然资源迅速枯竭的问题，等等。本体论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为人类确立某种终极目标，并诉诸人的理智，使人类关怀这种目标，并朝着这种目标不断追求精神的更高境界。当本体论被消解和拒斥之后，许多人没有了这种终极目标，没有了精神完善的追求和终极关怀，任由自然本性（感性）摆布；理性不

参见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是用于对精神无限性的追求，而是被用作满足物质欲望的工具。终极关切的缺失，不仅使人类感性化、使人生表层化，而且使人的身心之间、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和不可调和。

正由于本体论哲学所承担的其他哲学形态所无法替代的哲学使命，作为为人类自身在世界中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的价值哲学，不能也无法消解本体论在价值理解中的意义。从当代西方价值理论的逻辑发展来看，价值理论正在经历着由规范性价值论向元价值论、认识论价值论向本体论价值论的转变。19世纪以前，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建立关于价值问题的规范理论体系，其主要任务一是做出价值陈述或价值评价，二是为价值陈述或价值评价提供必要的规范论证。自 G. E.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之后，现代哲学家们开始放弃为建立规范价值理论而努力的传统，转而致力于确定价值是什么和探讨价值陈述或价值评价的根据和标准是否具有合理性基础等价值元理论问题。价值理论由规范性价值论向元价值论转变的背后，包含着价值理论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由认识论价值论向本体论价值论的转变，包含着在本体论承诺基础上开展价值理论研究的主体转换。

价值理论的这种转变是与现代本体论从众多的诘难和挑战中重新崛起、在哲学思想体系经过自身调整和变革后重新提出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哲学主题直接关联的。

以“拒斥”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为例，科学主义强调科学的理性、客观性、逻辑必然性等特点，满足于形而下的“小事物”的精细分析，并以这种“科学”精神去规范哲学研究。但其客观结果却是，在科学主义的形式下，科学被顶礼膜拜，成为信仰的对象。科学主义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宗教或类宗教。它以科学至上和科学万能论的观点武装人，以科学的方法要求人，并以科学

的标准评判人，人离不开科学，也不得不受制于科学。在这个层次上，科学被泛化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图景：它作为对存在的规定具有了某种本体论的意义，并构成了建构世界的普遍原理。就这样，科学主义在哲学观上反对的形而上学在其价值观上又被体现出来，而且是将自身作为形而上学的绝对本体来看待的。可见，形而上学是他们想拒斥却排除不了的哲学根本问题。例如，早先用“证伪”方法给形而上学和科学进行了严格划界的波普，后来又不得不承认形而上学是不可避免的“假设”。奎因也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包含着本体论的“承诺”，都要以自己的本体论作为前提，当人们谈论某件事物时，只要说某东西存在，他就有义务接受某种本体论的论断，即承担了一种含有某种性质的本体论，将某物作为本体论的基础。按奎因“本体论的承诺”的逻辑来说，一方面，在做出一种理论之前，就没有确定该理论中概念的意义，概念所指的东西是否存在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任何理论都是虚构的产物，在虚构某一理论时也就约定了这一理论中的概念所指的东西的存在。科学主义由拒斥形而上学到“本体论的承诺”，意味着本体论在实证主义冲击下走向式微后的“复兴”。

而人文主义价值理论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说，其真正精神就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即它的本体论、宗教观和非理性主义性质。人文主义侧重于研究语言的“体”，即语言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终极确证。在它看来，科学主义哲学支持下的技术理性帮助建立起了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人的生存能力得以增强，社会历史发展到了更有保障、更安适、更有主动性的阶段。然而，人的灵性、生存的意义、有限的超越、神秘的领悟、抉择的苦恼、灵魂的皈依、无限和永恒……这一切都不是数学式的思维和理性的三段论逻辑推导等科学化了的哲学体系所能感触到的；技术理性和科学知识建立的现代国家、社会制度成了对人异在的客观力

量。反过来窒息着人的内在灵性。对物的追求意志越强烈，向外部世界攫取越多，自我越迷茫。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越成疑问。理性能使人知识渊博，但也能使人的自然灵性减退。人本主义对工业文明的生活世界中出现的轻狂和功利态度以及科技理性造成的非人化境遇有着深切的体验和独到的感受，他们重提人生的意义，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殚思竭虑地试图去克服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现象与本质的尖锐对立，以恢复人性的完美统一。这些，都不能不说，与其对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后现代哲学的“文本论”哲学范式的提出，显现了在对传统哲学的解构中完成了对其主、客体关系模式及其局限的克服。

“文本”概念的提出和本体论上给予承诺，无疑在主、客体统一的形态上获得了可直接面向认知的对象范畴。这样，其哲学范式显现了与以往哲学完全不同的思路。在这样一种哲学基础上，也给对人类生活的理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全新的思维视野。针对价值学也是如此。传统的价值内涵都是在现代主义哲学范式下界定的，深受主、客体关系模式的束缚而造成不能达成基本一致的认识。后现代主义的统一了主、客体的“文本论”哲学范式，对于价值界定中克服主、客体二分式的逻辑主义局限和实现其定义的更加完善化成为可能。无疑，在后现代主义文本论的视野中，价值显然是一种文本而已，是凝含了主、客观于一体的人类“生存”的现象范畴，它和人类生存的时间性等范畴一样都具有本体性。因此，价值不仅是实践的、历史的、内在的或客观的、外在的、确定的，而且是二者综合统一着的本体性规定。用后现代主义视野的话语，价值是主客体相统一的一种文本性现象。在后现代主义“文本论”基础上来理解价值，一方面排斥了价值的“主观”定义倾向，也排斥了“客观”定义倾向。事实上，价值是凝含主、客体二元要素统一而存在（显现）的，二者

不可偏废。而“价值”的“文本”陈述，一方面承诺了主体要素参与“价值文本”的制作的能动性，一方面又承诺了客体要素作为“价值文本”承载的客观实在性；从文本的显现、生成而言，在其发展中既是人的实践的构建过程，又是文本自律性生成的规范、演进。完全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基础上的价值理解是富有创新的和更加符合事实的，应引起重视。

上述可见，无论是科学主义哲学在语言逻辑的框架中重新关注本体存在的表述，还是人本主义哲学以变形的方式承接人类理性对本体论的意向性追求，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统一了主、客体的“文本论”哲学范式转换，都进一步地说明了：在当代提出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设想中，不可回避地又提出了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哲学主题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已经由传统哲学对于世界万物本源的追求转向对于人的人伦世界或人的一切知识的本根的追求；由力求透过变幻不定的自然现象去窥视其不变的原因和真理，转向为短暂、有限的人生寻求安身立命的基础，以及为各种哲学的、科学的、常识的知识寻求统一的逻辑语言基础。现代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这种转向，既是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中人的异化处境、科学技术及语言学、逻辑学迅猛发展状况的哲学反映，同时也是哲学本体论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价值论域来看，本体论源于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这意味着本体论必须设法通过某种途径超越人类自己有限性的局限，从整个宇宙自然的角度的看待自己的地位和存在目的。“本体论的对象不是现成具体的事物，它所关涉的是人类理性的根本理想，不仅如此，由于人类理性是一种向某种理想境界的无限开放的未定型的存在，因而其‘终极关怀’的对象同样是始终处在生成之中的开放的理想对象。就此而论，本体论的对象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人类为自己营造的理想